

 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丛书

红色的旅程——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袁秉达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丛书

红色的旅程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袁秉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的旅程：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袁秉达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8

ISBN 7-5439-1785-8

I. 红… II. 袁…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②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IV. 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075 号

责任编辑：葛志刚

· 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丛书 ·

红色的旅程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袁秉达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5 字数 49 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100

ISBN 7-5439-1785-8/Z · 982

定价：5.50 元

— — — — — 〈 内 容 提 要 〉 — — — — —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七一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体现了我党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的突破。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全面深刻地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政党。勇于理论创新、敢走自己的路和善于把握规律,是富有战斗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成熟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诞生至今,已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了 80 年的光辉征程。这是一个“红色的旅程”。在近现代史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即为之一新。历史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光辉党史,是一个宝库、是一座丰碑、一部巨著、一笔财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它给人以信念、力量、智慧和启迪。总结和研究其 80 年的辉煌历程、光荣业绩和基本经验,有助于我党更好地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有利于广大人民更加信任党的领导和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本书紧扣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的基本精神,以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首要经验为主线,从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角度楔入历史、并贴近现实,对党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探讨。文中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说明了作者在党史研究中的体会与思索。最后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阐述了党史教育和党建研究问题。

— — — — —

作者简介



袁秉达,男,1950年11月出生,祖籍浙江绍兴。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管理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副教授,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主编或合编著作10多本,主要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比较研究》、《新时期统一战线概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区论》、《“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等,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主编的《当代大趋势与新发展》一书,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图书二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有多篇论文获上海市宣传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优秀成果二等奖或三等奖;并连续多年被上海市委党校评为教学和科研双先进,并获记功奖励。

目 录

一、中国革命：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一）历史从这里发生转折	（ 2 ）
（二）走井冈山道路	（ 3 ）
（三）“上篇”与“下篇”	（ 6 ）
（四）理论创新与规律认识	（ 7 ）
（五）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0）
（六）理想信念是真正优势	（14）
二、社会主义改造：富有特色的伟大创造	
（一）“一化三改”	（19）
（二）中苏一开始就有区别	（23）
（三）改造了不起，只是急了些	（24）
三、现代化建设：两个“搞清楚”的突破	
（一）“以苏为鉴”的最初探索	（28）
（二）拨乱反正的重新探索	（38）
（三）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46）
四、民族复兴：“三个代表”的历史使命	
（一）“政治交代”新起点	（48）
（二）新世纪新契机	（49）
（三）顺应历史新潮流	（50）
（四）探求规律的自主创新	（54）
（五）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55）
五、党史教育与党建研究	
（一）党史教育是优良传统	（59）
（二）党史教育与“四信”	（60）
（三）党史教育与“三个代表”	（62）

历史指事物发展的过程。历史不能割断，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学习与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因为它教人聪明、使人深沉、令人充实。

唐太宗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则提醒人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们也常说：“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这些名言都说明人们了解与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

党史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和党性都很强的专门史。担负今日领导重任的广大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与理科出身的干部，更要重视学历史、学党史，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史修养。学习与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利于更加深入领会党的路线和政策，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

为此，笔者主要结合自己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关于党史研究的一些体会，向读者介绍我党建党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光荣业绩和基本经验，以求增进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我党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一、中国革命：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人民也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

在悠悠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从古代的孔夫子到近代的孙中山，有多少志士仁人为追求心目中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而呕心沥血、上下求索，鞠躬尽瘁、探求不息。特别在近代，人们为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和社会发展的出路，更是前赴后继、奋斗不止。无情的是，追求理想社会的这些努力、牺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化为历史的泡影。然而，时代总要前进。20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第一春，这一不幸的历史终于走到了尽头：一轮旭日终于在东方升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黑暗的神州大地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一）历史从这里发生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成为近代中国的人们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历史主题。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的出路究竟何在？太平

天国的农民革命和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昙花一现；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辛亥革命也未能逃过最后失败的命运。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说明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与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

辛亥革命失败后，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彷徨的时候，俄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随后的兴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改变了救国的方向——决定“以俄为师”，以世情、国情、民情为依据，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历史及其发展一步一步地证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和科学领导的必然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二）走井冈山道路

无产阶级政党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如何领导社会

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新课题。

伟大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指出,在人类从今天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上,必然会表现出多样性。他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强调,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列宁对东方落后大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极为重要。

但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按照《共产党宣言》等有限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仅有经验,我党当时的主要领导层认为可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显然,这是准备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一步走完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这反映了当时我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知之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乏真切的了解。及至1922年,党在二大上虽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区分,但陈独秀又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拱手将民主革命领导权让给了国民党右派,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导致了大革命于1927年的失败。

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条重要原则:只有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

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认真反思，认识到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坚决摒弃了陈独秀路线，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并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已在努力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但是，当时著名的三大城市起义都失败了。毛泽东在攻打长沙失利后，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上山”的主张，认为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革命的发展应由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入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转移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全国共产党员已经由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二十万人，红军也发展到三十万人。

这表明，在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党已成功地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开始找到一条“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井冈山道路”的开创对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给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 “上篇”与“下篇”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具体操作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创造性地分为“上篇”与“下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民族民主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相反,它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把这两个革命过程比作上下两篇文章,他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把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光辉著作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和领导权等问题。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全面地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找到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两步走”的革命理论。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造。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四) 理论创新与规律认识

历史告诉我们,在正确的道路找到以后,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往往还要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和斗争,甚至需要排除种种干扰和破坏。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当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初见成效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从本本出发,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并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讥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全国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组织几乎丧失百分之百,红军由30万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也由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

世界上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往往在失去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错误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所揭示的正确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从此便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仅在实践中最早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极其珍惜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不断将各方面经验概括、上升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过程中，要求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当时他认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却非常落后。他指出：“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给延安的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而精辟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

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科学易懂的解释，帮助全党同志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理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以及如何从事“理论工作”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时，指导人们解放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认为只有超越马克思、列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毛泽东本人首先身体力行，集中全党智慧，在长期艰苦的理论建设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 and 理论创新的结晶。党的“七大”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人们就能够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在各个革命阶段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中国革命规律的研究。例如，在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重视研究和把握“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认为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正因为毛泽东正确地把握和运用了这些规律，我党才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的选择、坚持和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独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对革命规律的科学把握。

（五）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毛泽东率领党和人民创造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战略与策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法宝。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重要总结。

（1）第一件法宝：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必须联合农民，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合唱”。无产阶级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则成了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基本特点之一。

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毛泽

东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带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指出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确定了党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并尽可能地保持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认为,具有买办性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无产阶级有必要也有可能同其某些集团建立统一战线。他指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但由于它们分属于若干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尖锐的时候,且如果当时之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那么从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同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建立了暂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样基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我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必须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进行团结;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性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使其尽可能坚持革命性,克服动摇性,以同我们建立联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同时,在和资产阶级联合时,党必须注意自始至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